2016.5.10 서천

1. 时代主题变化决定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吴建民

《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08日 05 版）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历史名著，记述了当时正在崛起的雅典和守成大国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2年撰文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关系中美两国，而且关系21世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许多根本性因素决定中美必须走合作共赢的道路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见奥巴马总统，双方达成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不冲突不对抗，为的就是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重蹈昔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战争的老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后来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也一再重申决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所表达的上述立场，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当今时代的主题、两国交往的历史和中美关系大发展的实践。

　　今年3月，基辛格博士在“中国发展论坛”上认为，中美两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今天很不一样。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今天的时代不仅与2000多年前的时代很不一样，就是与20世纪很长一个时期也不一样。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当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然而，时代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时代主题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时代主题既集中反映了一个时期世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又指出了解决主要矛盾的路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能解决问题。上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他们是劝不出去的，只能通过战争把他们打出去。但当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时，战争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和平与发展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国际关系的一大进步，它意味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丛林法则越来越行不通了，而和平与发展则是人类在21世纪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主导了三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利比亚战争。这三场战争不仅什么问题都没解决，而且还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欧洲所面临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从本质上看都与这三场战争有关。美国在时代主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坚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撞了南墙、倒了大霉，也给中东和北非人民带来了浩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得了历史性大进步。和平与发展能解决问题，中国的成就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所制定的战略。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是成功的，中国决不会放弃这个战略。

　　中美关系的历史也证明中美必须走合作共赢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是盟国，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并取得胜利。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敌对政策。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越南战场上也进行了激烈较量，代价也是沉重的。但是1971年以来，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进步。1971年中美贸易额仅为500万美元，2015年双方贸易额上升到56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过去45年中美关系大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为什么世界上不断有人声称中美必将走向对抗、两国定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呢？这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零和博弈的思维在世界上统治了几千年，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有些人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第二个原因是利益驱使。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因为他们能从对抗、冲突、战争中发大财。

　　关键是发展共同利益和妥善处理分歧

　　当然，事情总有两面。尽管中美双方都一再强调双方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这个危险也是存在的。看到这个危险，会促使我们加倍努力处理好中美关系。处理好中美关系必须抓住两个关键：发展共同利益和妥善处理分歧。

　　从现实看，中美在三大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第一，中美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今天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有很多，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人类只有携起手来才能生存下去。第二，中美之间的双边合作，诸如经贸、科技、教育、人文领域仍然存在巨大合作空间。第三，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也存在巨大合作空间。军事安全领域十分敏感，但双方也存在着众多利益汇合点。发展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的重要抓手。不开展合作，分歧就会把双边关系往后拉，这是中美双方需要高度警惕的。

　　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摩擦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才能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首先双方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有分歧、有摩擦是必然的。因为中美双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文化，又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分歧和摩擦是一定会有的。对于分歧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估量，而且要认识到分歧只能通过对话才能解决，不能搞对抗。对分歧还要辩证地看，有时候分歧处理得好，会变成双方合作的新亮点。为什么分歧能够成为合作的新亮点？因为即便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也存在共同利益。既看到分歧，又看到共同利益，把注意力转移到双方的利益汇合点上，情况就不一样了。

　　总之，有很多根本性的因素决定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危险的存在。我们要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使中美关系不仅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且能在各个领域迎来新的大发展。那样的局面，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幸事，而且是21世纪世界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福音。

　　（作者为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2. 关键是自身发展起来，以新型大国关系取代对抗性大国关系

陈 岳

《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08日 05 版）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记述公元前5世纪发生在西方文明核心地带希腊世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将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总结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达不可避免的恐慌”。修昔底德描绘的正是当时发生在希腊世界的权势转移过程导致的悲剧性战争结果。因此，当人们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时，实际上是在强调国际关系中权势转移的巨大风险及其难以逃脱的暴力与冲突的宿命。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超越传统权势转移理论，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既是对外战略的现实需要，也是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亟须回答的理论命题。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大的现实。把“修昔底德陷阱”和中国和平发展联系起来，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国和平发展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当代国际体系的挑战，源自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随着布热津斯基等有着重要影响的政论家的先后跟进，国际上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越来越难以绕开“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质就是用传统权势转移理论来看待当今中美关系。传统权势转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中权势转移的结果往往是新的单极霸权取代旧的单极霸权。然而，即便从权力结构来看，单极向两极或多极的转移都可能是权势转移的选项。权势转移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并不必然是一个大国取代另一个大国，也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两极并存或多极共存的权力结构。从历史上看，权势转移可分为全球性权势转移与地区性权势转移。不可否认，历史上的地区性权势转移大多伴随着战争，但全球性权势转移则并非如此。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出现之后，真正能称得上全球性权势转移的只有19世纪末开始的英国向美国的权势转移，而这可以说是权势和平转移的案例。因此，简单用传统权势转移理论判断中美必然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恰当。而且我们还要认识到，当今的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使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大国间的核均衡在消极意义上防止了大国间战争的发生；大量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使国家间共同利益大量出现。所有这些无不预示着时代变了，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如果真会出现权势转移，更有可能实现和平转移，这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确立了共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方向。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6个重点方向，2015年9月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4件尤其要做好的事和今后发展的6条重要建议。可以说，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取决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成败。新型大国关系所针对的就是传统权势转移中出现的对抗性大国关系，就是要超越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历史参照的传统大国关系所衍生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建立一种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以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有序竞争和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是适应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

　　能否成功构新型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尽管中美之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但我们更要认识到，中国自身的发展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前提。中美关系能有今天合作竞争的局面，得益于中国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未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再保持一段时间的较快速度发展，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没有中国自身的发展，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只有全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综合解决人口合理均衡增长、经济转型升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各种制约发展的重大问题，保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国内大局长期稳定，才能增加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最终力量源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3. 全球价值链有助于抛弃冷战思维

余南平

《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08日 05 版）

　　“修昔底德陷阱”近年在美国学术界被热议，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显性话题。虽然睿智的基辛格博士以自己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判断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信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学术界乃至部分政治家还是对中国保持深度的怀疑和过度的审慎，特别是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比较恐惧。难道“修昔底德陷阱”真是大国之间不可消除的魔咒吗？当然不是。从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来看，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讨论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时，我们特别有必要对当今国际体系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新的审视，深刻认识这种依赖关系对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无论在修昔底德时代，还是在二战之前，国际权力一直奉行的是帝国统治原则，无论这个帝国是以直接管理还是以实质联盟的形式出现。就帝国权力模式而言，疆域的扩张大多要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终极解决。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既来自帝国统治者对荣耀的追求，更由于传统农业时代生产方式的内在特征。在传统农业时代，各国之间缺乏生产上的相互依赖，国家的强大更多取决于征战后的战利品获得，而不是产业链的扩张和对产业链高端的占有。因此，帝国权力模式下的全球非依赖关系是“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根源。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形成虽然在形式上改变了帝国权力模式，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出现了冷战，同时也形成了全球“平行市场”结构。在全球“平行市场”结构中，美国和苏联之所以能够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并不是因为相互之间拥有相互融合的产业链和相互投资，而仅仅是因为相互威慑。就生产体系而言，从未出现过全球生产体系的内在有机融合。

　　然而，在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后，上述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今天已经完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和全球价值链。除了坚持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治理模式，中国并未试图在全球建立“平行市场”。因此，在逻辑上可以肯定的是，冷战结束后，全球生产体系的融合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现实基础。今天，大国之间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主要取决于大国主观上的战略认知。就中美关系而言，主要取决于美国能否抛弃冷战思维。

　　当前，随着全球生产体系的融合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美双边贸易额2015年已高达56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客观地看，在全球价值链中，美国由于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始终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在中国与美国产业链的融合中，虽然中美双方都能受益，但美国受益显然远大于中国。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后经济话语权的提升。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不仅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同时也给全球提供了相对廉价和可靠的产品，有助于全球价值链的完整与竞争，也有助于更多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从而增进全球福祉，这些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还要看到，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以人民币汇率为例，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的波动不仅影响两国贸易，还将影响其他国家的汇率，从而成为全球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大问题。这不仅表明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更表明各国之间都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审视中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不同的是，今天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源自全球生产体系、全球价值链中中美两国自然有机的融合。这个历史性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不仅消除了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现实基础，同时也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找到了路径。只要中美之间加强对话与合作，中国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溢出效应能够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也符合美国发展的内在诉求。美国需要避免的是无视经济全球化中已经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以冷战思维树立假想敌，人为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断裂。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